

第一章 到武汉保陈再道

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厅，那棵枝叶繁茂的海棠树被烈日映得发光；偶尔吹来一阵风，树叶闪烁得像无数面小镜子。

周恩来摇动一把折扇，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扫过秘书们的面孔，点点头，表示强调，然后将折扇用力摇两下，抬高声音：“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一位秘书手捂那部保密电话的话筒，小声报告：“总理，陈再道接通了。”

周恩来点点头，快速向电话机奔去……

— “武老谭”

“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

作为一方“诸侯”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这样回忆那个苦热的夏天：

“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少变化；热气笼罩着武汉的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进了蒸笼里，立刻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无心观赏院内的景色，只觉得由树木汇成的绿色上面，又蒙上了一层苍白的颜色。路边，桂树的叶子曲卷着，樟树的叶子曲卷着，竹子的叶子曲卷着，杂草的叶子也曲卷着，仿佛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考验。

不善言语的陈再道，就这么一切都是“曲卷着”度日。

终于听到了北京的消息，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陈再道同志，我是周恩来……我正要谈这件事。

① 《人物》 1989年4期 27页

你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你们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再道松口气：“这下好了，主席来武汉，可以当面向他说明问题了……”

可是，马上又“有些喘不过气来”。两次到北京都没讲清，越搞越糟，这次在武汉就能讲清吗？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被称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的孟锦云，在九十年代初向笔者回忆了那位杰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论：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

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也许正是《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所揭示的深层道理？“文化革命”终于无可避免地被“武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武汉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潮，被称为“一月风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满意地给予支持，用他那高亢的声音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同上海的“秀才”们不同的是，毛泽东深知“关键时刻的政治，靠军事实力说话。”所以，夺权风暴一起，他便及时召来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进京参加军委碰头会，并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实事求是地讲，各路“诸侯”无不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但命运注定他们是无法跟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贯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党。”他又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

军队是该维护党的领导还是该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一贯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他又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么——

军队是该帮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还是该支持造反的人们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他一贯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支持“群众”还是支持“派”？

他一贯要求军队“宣传教育群众”，他又说“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加强纪律性”还是该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

导师和统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这种混乱和矛盾，源于他对自己亲自缔造领导的党和国家的不满，对社会主

义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失望，源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了。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牌香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了？”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了。”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头：“反对官僚主义，讲群

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了。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进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陡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做出决策后的两条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

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入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月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

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让地方的大批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也难怪武汉的造反派称他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也难怪三月下旬，他又被紧急召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重新端正思想”了。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是根据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所写的社论，经王力修改后发表。陈再道一看就知道是批判和警告他不要压制造反派。

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

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陈再道的“成绩”变成了“罪行”。

四月十六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二十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

“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了”？陈再道这样自问，却又“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心里委屈、窝火，又生就一个炮筒子脾气，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话讲得非常真诚了。“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表明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态度，也符合副统帅林彪所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要求。

可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不是推责任，撂挑子，搞赌气吗？想

给中央文革出难题还是闹示威？

江青雷霆震怒，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此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果真一律不予答复。

至于副统帅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中，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心情郁郁地返地回武汉时，“坚决揪出武老谭”和“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已铺满全城。一度沮丧的“造反派”仿佛打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起来，以新的势头四处冲杀，八方造反。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被“钉”在武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配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然而，正像毛泽东所讲，天下万物万事莫不一分为二。对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一样，有群众反对，就有群众支持。那些表态支持的群众在五月十六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不加分析地把党政干部统统打倒。这批群众在人数上占了大多数，一下子就把“造反派”孤立了起来。

陈再道在感情上无疑站在“百万雄师”一边。但从大局着眼，又必须保护那些造反的“闯将”。军区几经研究，采取了“支左”不支派，支持广大群众的态度。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大家都是干革命，不要再打内战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公告》还对军区的“支左”工作做了检讨，承认存在缺点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批评。

早已杀红了眼的各派群众组织哪里听得进《公告》？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百万雄师”认为是“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

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不管武汉军区事情的中央文革突然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

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电报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们紧张、不安，费尽心力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有二十来天没再发生大规模武斗。现在，总理来电话讲，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用进京汇报了，毛主席要亲自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亦喜亦忧。

喜者，毛主席要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陈再道，毛主席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忧者，严重对立杀红眼了的两派，能马上放下刀枪握手言和吗？林彪、江青能放过自己吗？……

毛主席要视察南方，得到消息的不止一个陈再道。有多少“诸侯”同陈再道一样，亦喜亦忧。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巡行调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所在地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次的视察……

二 碰头会

人民大会堂默默地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这座大跃进中诞生的巨型建筑，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高大魁伟的廊柱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立体面，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当大会堂投下的身影悄悄向东延伸，几乎覆盖了正门全部台阶时，一辆辆“红旗”轿车驶入这座巨型建筑的天井。走出轿车，陆续进入大会堂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全体成员。自从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了活动。政治局碰头会也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现在，中央文革大权在握，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下午。

三点整，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他的照例只有林彪。

自从林彪被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后，迎接毛泽东便成为林彪的“专利”。每个公开活动的场合，林彪总是早到两三分钟，等待毛泽东到达，然后陪伴毛泽东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讲究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此名分无以证明“副统帅”“接班人”的事实。

林彪迎上一步，只迎一步便握住了手。据说自从“九大”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后，林彪有了变化。每次毛泽东出现，他会迎上三步，握住毛泽东的手。多走两步是因为起步早，迈步快；他多走两步，毛泽东就可以少走两步。据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

没当上国家主席便又有了变化。或者迎一步握住毛泽东的手，或者一步不迎，待毛泽东走到身边时才握握手，然后随毛泽东身后步入会场。他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小动作中泄露内心的情绪。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握手的瞬间，一生不苟言笑的林彪，从嘴角流出一丝笑纹，头一低，轻叫一声：“主席”。

“嗯。”毛泽东略一点头，便放开手径直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也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有脾气好么，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知情人都说，这话多半是讲林彪呢。

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师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主席休息时，敢闯主席卧室的也是他们俩。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闯到主席床边；林彪一脸肃杀之气闯入丰泽园，闯入菊香书屋，直到卧室门口才向卫士喝令：“马上报主席，我有急事。”林彪比彭德怀略有分寸。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不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也没有顶撞的机会了。林彪又不同，他是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

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了。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只剩了公众场合喊万岁，终于变成了“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

所以，不少人说：毛主席不怕林彪当面顶撞，讨厌林彪当面笑。“有脾气好么，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

现在，毛泽东走在长廊的地毯上，四周围静悄悄，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色彩。也许他有些惆怅？过去有幅画照，叫“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也熟悉。那上有毛、刘、周、朱、陈、林、邓。自从林彪成为“最亲密的战友”，这幅画就泯灭了。

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服务员远远打开会议室的门，毛泽东脚步不顿地走入会议室。

室内转圈摆满沙发，正在喝茶交谈的与会者已经全体起立；军人敬礼，文人鼓掌。毛泽东随意做个手势，去周恩来的身边坐下。林彪跟随其后，在他右边入座。

毛泽东刚坐稳身子便吸燃一支香烟；吸过一口烟便将目光扫过与会者；扫过一轮便伸出右手，用夹了香烟的左手去掰没有夹烟的右手指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略提高点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

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容不迫又突如其来地摆在集体